

● 社会学

社会转型期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探讨^{*}

刘 祖 云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刘祖云(1954-),男,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主要从事社会学理论和发展社会学研究。

[摘 要] 社区建设就是社会生活共同体建设,其本质内涵是满足或服务于居民的生活需求;社区建设一般是由社会转型而引起,在当前中国社会也有其特殊原因:从社会层面看,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将使政府、单位和家庭的有关或部分生活职能剥离或外移给社区。从个人层面看,城市的无业人口、流动人口及老年人口暂时或日趋增多将给社区建设提出愈来愈多且愈来愈高的要求;社会性、地域性和生活性是社区建设的基本特征,也是社区建设与政权建设等其他组织建设相区别的重要标志。

[关键词] 社会转型;社区建设;理论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999(2001)03-0376-05

社区建设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作为一个社会学者,笔者也无不为之动心并被新闻媒体的有关宣传和学术界的有关讨论所吸引。笔者一方面系统阅读和了解了学术界关于社区建设的讨论,另一方面应邀参观了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社区。笔者试图就何为社区建设、为何要进行社区建设以及社区建设有何特性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关于社区建设涵义的理论探讨

社区一词源于拉丁语,意思是指共同的东西或亲密伙伴间的关系。社会学上首先使用社区这一概念的是德国社会学家 F·滕尼斯,他于 1881 年首先使用 Gemeinschaft 一词,1887 年出版了《社区与社会》一书。滕尼斯认为,社区 Gemeinschaft 实质上是一种乡土社会,即是一种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密切、习俗相同、并富有人情味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会 Gesellschaft 实质上是一种法理社会,即是一种具有不同价值观的异质人口组成的、重契约而不重习俗、重理性而不重人情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在这里,滕尼斯只是强调了社区概念的社会性而没有涉及其地域性。后来随着社会学从欧洲传入北美,特别是随着美国经验社会学研究的兴起,社区一词被赋予“地域性”而不再特指乡土社会或传统社区,即英文中社区(Community)一词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变化,不仅包括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涵义,而且包括地域生活共同体的涵义,不仅包括传统社区,如乡村社区,而且包括现代社区,如都市社区。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社会学界将英文 Community 译为“社区”。此后,社区一词的涵义虽然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但其基本性质没有变,即生活性、社会性和地域性是其本质特征,社区是指以一定地域界限为基础

* 收稿日期: 2000-12-12

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会学中的 Organization(组织)与 Community(社区)的区别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区的特征,即前者一般是指业缘共同体、生产或工作共同体,后者则是指地缘共同体、生活共同体。

既然社区是以一定地域界限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共同体,那么社区建设就是社会生活共同体建设,就是建设社区。然而,目前我国学术界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操作层面上也是百花齐放,出现了所谓“上海模式”、“北京模式”、“天津模式”、“沈阳模式”等,仅在武汉就有“江岸模式”与“江汉模式”之分。概括我国当前的不同说法和做法,可以归纳为二类:一是广义的理解和做法,即社区建设是指在一定社区内所开展的各种活动和建设;二是狭义的理解和做法,即社区建设是指在一定社区内所开展的某项活动和建设,或社区服务、或社区经济、或社区管理等等。导致上述不同看法和做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对社区这一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即经典的理解和非经典的理解。经典的理解就是已于前述的社会学的理解,非经典的理解就是将社区与区域乃至行政区划、经济区划混为一谈。当然,在实践过程中,为了操作的方便,将社区与行政区或经济区视为同一也是可以的,而且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和操作上的百花齐放无疑有利于社区建设的开展。但我们应该弄清楚我们所使用的概念和所开展的活动的本质内涵,即社区建设的本质内涵究竟是什么?

笔者认为:社区建设与企业建设、学校建设及机关建设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它是一种生活文明建设,是为了满足或服务于居民的生活需求。国家民政部多吉才让部长指出“社区服务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基础性工作,而社区建设是社区服务的延伸、拓展和升华。”^[1](第 2 页)多吉才让部长的这一讲话不仅指出了我国开展社区工作的历程即经历了从社区服务到社区建设的提法或做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区建设的本质内涵。国家民政部李宝库副部长也曾指出:“抓社区建设首先要抓好社区服务,以社区服务为突破口,巩固和完善社区服务阵地,发挥社区服务在社区建设中的龙头和示范作用。”^[2](第 4 页)北京大学的王思斌教授也指出:“如果我们从更加本质的角度看问题,用‘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去看待社区建设,那么社区服务、社区卫生、社区治安、社区文化建设就应该成为社区建设的核心内容。因为这些方面的活动更能直接地促进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当然,这并不是说社区建设不需要发展社区经济,不需要进行社区管理。”^[3](第 6-7 页)

如果说以上论述在理论上回答了什么是社区建设的本质内涵的问题,那么百步亭社区的社区建设则在实践上回答了这一问题。百步亭社区是一个规划用地 200 公顷,可入住 10 万人口的新建社区,该社区的社区建设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即从社区规划到社区管理,从社区管理机构的设置到社区管理制度的制定,从社区硬件建设到社区软件建设,都以满足或服务于居民生活需求为基础或前提。从硬件方面看,百步亭社区不仅设有商店、学校、医院、保卫等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的设施,而且设有百步亭(即百步一亭)、中心绿化广场、百米文化长廊、阅报栏、阅览室以及足球场、网球场、篮球场、门球场等满足居民专项生活需求的设施。从软件方面看,百步亭社区虽然没有传统的“健全”的管理机构,但有严格、规范的管理制度,有合理、高效的管理运行机制;有定期开展的各种文体活动;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区精神;有教育援助会、慈善援助会等社区弱势群体的“爱心工程”等。而这些又来自于物业开发者(物业开发公司)、物业管理者(物业管理公司)和物业享用者(居民或业主委员会)三者有机结合的新型管理模式。一流的服务设施和一流的服务水平必然带来一流的服务效果。仅从卫生角度看,百步亭社区达到了“三无”,即无烟头、无纸屑、无果皮;而从安全角度看,百步亭社区实现了“七个没有”,即没有一户居民家中被盗,没有一辆自行车被盗,没有发生一起刑事案件,没有一次交通事故,没有一桩邻里纠纷,没有一处黄赌毒,没有一位法轮功练习者。正因为如此,百步亭社区居民具有较强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百步亭社区因而形成了较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参观完百步亭社区,笔者似乎看到了我国社区建设理想模式的雏形。

二、关于社区建设原因的理论探讨

一般来说,社区建设是由社会转型引起的。所谓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渡过

程,是社会的结构性变革和整体性发展^[4](第 41 页)。在传统社会,因社区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封闭性,社区成员之间的直接互动较多、频率较高,社区成员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较强,社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以及社区成员之间相互关照、相互帮助的功能也因此较强。随着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特别是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传播媒介的发展以及居住方式的变化,社区的封闭性减弱而开放性增强,社区成员间的直接交往或以社区为纽带的交往减少,其间接交往或不以社区为纽带的交往增多,社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以及社区的功能日趋减弱。为了阻止这种趋势或为了恢复社区的功能,社区建设便应运而生。譬如,20 世纪 70 年代的香港曾经提出和实施社区建设计划,尽管这一计划包括许多具体内容,但其宗旨是要建立“互相关怀和负责的社区”^[5](第 121-123 页)。又如,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又兴起社区主义(Communitarianism)活动,尽管这一活动可能有其复杂的经济或政治背景,但其直接目标是为了加强社区居民之间的交往以实现相互关怀。现在,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社区之所以每百步设一亭,除了用传统的或民族的建筑风格来装饰和美化社区外,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给居民提供更多的相互交往的场所并借此实现其守望相助。由此可见,社区建设就是为了建设社区,就是为了恢复或加强社区的凝聚力、向心力及社区的功能。社区建设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

在当前中国社会尤其是城市社会开展社区建设,除了以上所说的社会转型这个一般原因外,还有其特殊原因。这是因为中国的社会转型有其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又集中表现为社会结构转型(即从传统型结构转向现代型结构)与经济体制转轨(即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同步进行。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不仅加重了社会转型的任务和难度,而且对社区建设特别是城市社区建设提出了多重要求,对此,我们可以从社会整体和个体两个角度来进行分析。

从社会整体或组织的角度看,一是社会转型在宏观结构层面上表现为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即社会的宏观管理模式将由政府包揽一切转变为“小政府,大社会”。这就意味着原来政府所承担的众多职能特别是社会生活职能将剥离给社会,而代表社会接受或承担其职能的社会组织首推社区;二是社会转型在中观结构层面上表现为企业、学校、医院等单位组织的结构分化和功能专化,即社会的中观管理模式将由“单位办社会”转变为“社会办单位”。这就意味着原有单位的许多职能(如企业的非经济职能、学校的非教育职能、医院的非卫生职能等),特别是社会生活职能也将外移给社会,而作为单位所在地域的社区组织毫无疑问是其外移职能的主要承担者;三是社会转型在微观结构层面上表现为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和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家庭结构的简单和家庭人口的减少必然导致家庭职能及家庭事务的外移,而作为家庭结合体的社区也无疑是家庭外移职能或事务的责无旁贷的承担者。

从社会个体或成员的角度看,一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推进,社会的无业人口将在一定时期内增多。由于我国目前的无业人口是因新旧体制交替而暂时退出生产领域并完全滞留在生活领域的人口,因此,作为人们生活共同体的社区就是他们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活动场所,这无疑加重了社区建设或管理的负担;二是随着我国社会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的流动人口将日益增多。由于流动人口不仅生活在社区,而且其工作也主要在社区,加之流动人口的异质程度和变动频率很高,因此,流动人口的日渐增多将给社区建设或管理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三是随着我国社会生活水平和医疗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的老年人口也将不断增多。由于老年人口也是退出生产或工作领域而完全安度在生活领域的人口,因此,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等各种满足老人需求的工作或任务将主要由社区来承担,而且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多,这种满足老人需求的工作或任务将会愈来愈繁重。

总之,我国的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给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提出越来越多且越来越高的要求,因此,加强城市社区建设,对于当前我国社会的改革、发展与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关于社区建设性质的理论探讨

社区建设的性质,前面关于社区建设的涵义和原因的探讨中已有所涉及。由于社区建设是为了建设

社区,因此,要明确社区建设的性质,首先必须明确社区的性质。由于社区具有地域性、生活性和社会性,社区建设毫无疑问也具有这三种特性,而且这三种特性正是社区建设与政权建设等其他组织建设相区别的重要标志。

社会性是社区建设的首要特征。社区是以一定的地域界限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空间范围内的表现。因此,社区建设首先表现为人际关系建设。众所周知,传统社会或乡村社区与现代社会或城市社区在人际关系方面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前者表现为紧密或亲密,后者表现为疏远或冷漠。造成这一区别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转型过程中人际交往的间接化,而人际交往的间接化又是由两个相互联系的因素引起:一是居住方式的相对封闭化,即住宅的高层化和别墅化使每一家庭的生活空间日趋独立或封闭,居民之间直接见面的机会因而减少;二是传播媒介的日益多样化,即电话、书信、网络等个人传媒和电视、广播、报刊等大众传媒的日益发展和多样化使居民花费在与媒体打交道的的时间增多,而花费在串门走户的时间减少。由此可见,社区人际关系建设实质上是社区的凝聚力和亲和力建设,这种建设在操作层面上就是为居民提供直接交往的场所和机会。在这方面,百步亭社区进行了许多尝试,他们一方面通过修建各种文化、体育及娱乐设施或场馆为居民提供直接交往的条件或场所,另一方面通过每年每月定期组织开展文化、体育、娱乐等公益活动为居民提供直接交往的时间或机会,结果使社区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明显增强。百步亭社区的成功尝试为我们开展社区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

地域性是社区建设的本质特征。社区建设的地域性表明,地域景观建设既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社区建设与政权建设等其他组织建设相区别的具体标志。一般来说,地域景观又分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前者为山、水、草、林等“原生的自然”,后者为房屋、道路、亭阁等“人化的自然”。因此,社区建设中的地域景观建设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如何保护和利用自然景观;另一方面是如何设计和建造人文景观。但无论是自然景观的利用还是人文景观的建造,其目的都是为了满足居民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求,都是为了方便居民生活、美化居民生活。在这方面,百步亭社区既作出了努力,同时也收到了实效。在百步亭社区,以人为本不仅仅是一种口号或理念,而且已变成了方便和美化居民生活的行动。当然,新建社区与老城社区的地域景观建设因其自然或地理条件不同而可能存在一定差别,但其建设都应该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都应该紧扣居民生活需要,都应该以方便和美化居民生活为目的。

与地域性相比,生活性是社区建设更为本质的特征。社区建设的生活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社区建设的过程看,社区建设活动主要或实质上是一种生活服务活动,即所有的社区建设活动都是为满足或服务居民的各种生活需求,而且这种服务是生活服务中最直接、最经常、最具体和最基本的服务。生活服务既是社区工作与政府工作、企业工作及学校工作等其他工作的区别所在,又是社区工作的意义所在,因为只有搞好生活服务,才能实现居民安居,而居民安居既是社区安定乃至社会稳定的基础,又是居民乐业乃至社会发展的前提;另一方面,从社区建设的结果看,社区建设主要或实质上是一种生活文明建设,而不是生产文明或管理文明建设;是为了建设一种文明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而不是为了建设某种工作环境和方式。当然,生活文明建设中也有个管理问题,也有个管理模式和制度的问题,但这些都只是生活文明建设的手段,而决不是目的。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因此,选择或评价社区管理模式的惟一标准是看其是否有利于社区生活文明建设。百步亭社区的三位一体管理模式虽然有别于传统或现存的其他管理模式,尚有待改进和完善,但它促进了社区生活文明建设,因此我们应该对其给予充分肯定。

参 考 文 献

- [1] 多吉才让. 在北京市社区服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R]. 基层政权与社区建设工作简报, 1999, (39).
- [2] 李宝库. 夯实城市基层基础, 积极发展社区建设 [J]. 城市街居通讯, 1996, (6).
- [3] 王思斌. 体制改革中的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分析 [J]. 北京大学学报, 2000, (5).

- [4] 刘祖云 . 从传统到现代: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研究 [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
- [5] 香港社区教育工作者联席会议编 . 社区工作理论与实践 [M].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4.

(责任编辑 车 英 于华东)

Social Transformation & Urban Community Building

LIU Zu-yun

(Wuh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LIU Zu-yun (1954-), male, Professor, Wuh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majoring in theories of sociology &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Abstract Community building is the building of common living space, the essence of which is to meet the needs of community residents. Community building is usually the result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However, there are particular reasons for it in China. I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ety, becaus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tc, responsibilities concerning daily lives previously shouldered by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and families are removed or taken over by communiti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s, requirements on community building become increasingly strict as a result of the rising of urban unemployment rates, population on the more, and senior citizens. Fundamentals of community building are the localization and day to day life which are also distinctive in making community building form the enforcement sovereignty and various organizations.

Key words social transformation; community building; theory